

■ 文艺理论研究丛书

中国古代



文论概要

秦德行 王安庭◎著

孙铭有◎主编

刘清海◎副主编

〔二〕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文艺理论研究丛书

中国古代文论概要

秦德行、王安庭 著

二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第四章

隋唐五代的文学理论

隋代文坛处于由南北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状态,宫体诗和骈文的泛滥之势尚未得到控制。但诗文论坛上已经出现了反对浮靡文风的新气象,隋文帝两次下诏改革文风于前,大臣李谔积极响应于后。文坛巨儒王通出来,倡导教化中心论的文学理论,号召全面复古。初唐最高统治者在文学方面,虽显示出宏大的气魄和雄心,但却提不出什么具体振兴文学的对策,倒是这时的史家却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的折衷的理论,虽不够彻底,倒也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,而史论家出来,以历史学家洞察敏锐的眼光审视文学,对华而不实的骈文和拟古成风极端的文字型文学予以有力的批判。“四杰”与陈子昂这些身兼文学家和理论家的杰出人物出来,把目光

更准确地对准了浮艳淫靡的文风，提出了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，引导唐代的文学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盛唐诗人们虽则聚精会神地忙于创作，但精力充沛的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，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诗歌理论的发展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。这时的理论家殷璠则逐渐摆脱了政教中心论的束缚，完成了向诗歌审美理论的过渡。中唐的诗歌理论异彩纷呈，诗僧皎然继殷璠之后，把诗歌审美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，而白居易则沿着传统的道路，把政教中心论推上了又一个高峰，这个时期，韩愈和柳宗元在诗歌理论之外又另辟蹊径，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古文理论，开展了中国散文史上的第一次大运动。晚唐五代时期诗歌走向了衰落，而诗歌理论却创造出了辉煌，司空图的《诗品》把皎然以来的诗歌审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代表了唐代诗歌理论的最高成就，随着词这一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，词学理论也在这时滥觞，欧阳炯的《花间集序》理论色彩虽还显得稚嫩，但它却成了词学园地报春的第一枝迎春花。

第一节 隋代的诗文理论

隋自文帝杨坚开皇元年(581)建国,至炀帝杨广大业十四年(618)亡国,前后共经历 38 年。隋代的文学在南北朝文风迥异的基础上起步,步履维艰,时日又短,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家和作品,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南朝的浮艳文风向北方迅猛渗透,甚至影响到新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。

隋代的文学理论则表现为对这种文风的抵制。最早出来“屏黜轻浮,遏止华伪”文风的是隋文帝,他于“开皇四年(584),普诏天下:公私文翰,并宜实录,其年九月,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,付所司治罪”^①。紧步文帝后尘,更严厉谴责浮艳文风的是治书侍御史李谔。谔字士恢,初仕齐为中书舍人,北周时拜天官都上士,与时任丞相的杨坚有深交。入隋历比部、考功二曹侍郎,旋迁治书侍御史。为隋文帝

① 《随书·李谔传》。

开国重臣之一。身为主管文化教育的督察、执法大臣，李谔对当时盛行的“体尚轻薄，递相师效，流宕忘反”^①的文体和文风极为不满，遂上书文帝，请求以行政命令的行动改革文风。他这次所上的书即通常所说的《上隋高祖革文华书》。书中说：

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，必变其视听，防其嗜欲，塞其邪放之心，示以淳和之路。五教六行，为训民之本；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，为道义之门。故能家复孝慈。人知礼义。正俗调风，莫大于此。其有上书献赋，制诔镌铭，皆以褒德序贤，明勋证理。苟非惩劝，义不徒然。降及后代，风教渐落。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词，忽君人之道，好雕虫之小艺。下之从上，有同影响，竞骋文华，遂成风俗。江左齐、梁，其弊弥甚，贵贱贤愚，唯务吟咏。遂复遗理异，寻虚逐微，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此擢士。禄利之路既开，爱尚之情愈笃。于是闾里童昏，贵游

① 《隋书·李谔传》。

总帅，未窥六甲，先制五言。至如羲皇、舜、禹之典，伊、傅、周、孔之说，不复关心，何尝入耳！以傲诞为清虚，以缘情为勋绩，指儒素为古拙，用词赋为君子。故文笔日繁，其政日乱。良由弃大圣之轨模，构无用以为用也。损本逐末，流遍华壤，递相师祖，久而愈扇。及大隋受命，圣道聿兴，屏黜轻浮，遏止华伪……闻外州远县，仍踵敝风，选吏举人，未遵典则。至有宗堂称孝，乡曲归仁，学必典谟，交不苟合，则接落私门，不加收齿；其学不稽古，逐俗随时，作轻薄之篇章，结朋党而求誉，则选充吏职，举送天朝。盖由县令刺史，未行风教，犹挟私情，不存公道。臣既忝宪司，职当纠察。若闻风即劾，恐挂网者多。请勒诸司，普加搜访，有如此者，具状送台。

李谔的这篇奏书，在阴霾笼罩的隋代文坛上空，犹如一声震聋发聩的霹雳；在六朝数百年形式主义独占文坛的夜空中，也如一支响亮的号角，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影响。该书不仅明确提出了摒弃齐梁浮艳文风的主张，态度坚决，号召有力，对遏止这种文风的蔓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，而且以“古先

哲王之化民”为立论的准则，以“择先王之令典，行大道于兹世”为旨归，最早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，同时还自始至终强调文学应以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”和“伊、傅、周、孔之说”为本的教化理论。这些观点的提出，对稍后的王通的政教中心说和复古主张，有着直接的影响，对初唐王勃和陈子昂的复古理论，甚至对韩愈、柳宗元的古文理论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追本溯源，隋、唐两代的文学复古和崇儒思潮都滥觞于李谔的这篇奏书。至于此书颁行天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坛风气的事实，那是有着深刻的广阔的社会历史原因。

隋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当推王通。

王通(584? —618)，现存的著作有《中说》十卷，体例模仿《论语》，可能为其后人和门人所整理，内容是记录王通的思想、言行。其中论及文学的本质、特征和社会作用，主要倾向是反对齐、梁以来以审美为中心的文学理论，而倡导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学理论，号召全面复古，与隋初李谔的理论一脉相承。兹录数则，以见其概：

子在长安，杨素、苏夔、李德林皆请见。

子与之言，归而有忧色。门人问子，子曰：

“素与吾言终日，言政而不及化；夔与吾言

终日，言声而不及雅；德林与吾言终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”门人曰：“然则何忧？”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，今言政而不及化，是天下无礼也；言声而不及雅，是天下无乐也；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无文也。王道从何而兴乎？吾所以忧也。”①

李伯药见子而论诗，子不答。伯药退，谓薛收曰：“吾上陈应、刘，下述沈、谢，分四声八病，刚柔清浊，各有端序，音若顷簏，而夫子不应，我其未达欤？”薛收曰：“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，上明三纲，下达五常。于是惩存亡，辨得失，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，君子赋之以见其志，圣人采之以观其变。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，是夫子之所痛也，不答则有由矣。”

子曰：“学者博诵云乎哉！必也贯乎道；文者苟作云乎哉！必也济乎义。”②

子谓文士之行可见：谢灵运小人哉！其文傲，君子则谨；沈休文小人哉！其文

① 《王道篇》。

② 《天地篇》。

冶，君子则典。鲍照、江淹，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；吴筠、孔珪，古之狂者也，其文怪以怒；谢庄、王融，古之纤人也，其文碎；徐陵、庾信，古之夸人也，其文诞。或问孝绰兄弟。子曰：鄙人也，其文淫。或问湘东王兄弟。子曰：贪人也，其文繁。谢朓，浅人也，其文捷；江总，诡人也，其文虚。皆古之不利人也。子谓颜延之、王俭、任昉有君子之心焉，其文约以则。

房玄龄问史，子曰：“古之史者辩道，今之史也耀文。”问文，子曰：“古之文也约以达，今之文也繁以塞。”^①

薛收问曰：“今之民胡无诗？”子曰：“诗者民之情性也，情性能亡乎？非民无诗，取诗者之罪也。”^②

综观王通的文学观，他对文学的基本特质认识是确切的，他主张诗歌应该反映“民之情性”。这一点，学术界向来有一种误解，指责王通“对文学的特点是缺乏认识的”，而只承认他重视“民间诗歌”。其

① 《事君篇》。

② 《关朗篇》。

实,王通所说的“民”,是泛指所有的人,“民之情性”即“人之情性”,而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民歌的“民”。王通文学理论的偏激,在于他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认识,他主张文学必须要“上明三纲,下达五常”,要“惩存亡,辨得失”,“兴王道”,要“贯乎道”、“济于义”。概言之,就是要为封建统治服务。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,从而冲淡了他对文学本质的正确认识。基于这一认识,他强调文学家要有高尚的品德,要有“君子之心”,而不能是“小人”、“纤人”、“夸人”、“鄙人”、“贪人”、“浅人”、“诡人”以及“狷者”、“狂者”。本来,强调作家要有高尚的品格是无可非议的,问题在于他对品格的标准采取了过分单一的解释,即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,这样就扼杀了许多本来优秀的作家。何况他这种以文观人的方式也容易导致片面化。为了有利于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,王通主张文学作品应“谨”以“典”、“约以则”和“约以达”。在这里,“谨”和“典”是指文章的内容,“约以则”和“约以达”是指文章的形式。单从广义的写作要求看,这些主张是无可厚非的。但王通的前提是文章要为政教服务,所以这里的“谨”和“典”就是要求文章具有符合儒家三纲五常的内容,形式要简约、规范、通达,要能为宣传儒道服务。这样就难免片面单一了。王通还反对文学作品的“傲”、“冶”、

“碎”、“诞”、“淫”、“繁”、“捷”、“虚”、“塞”、“急怨”和“怪怒”。单从文学的风格观照，他所反对的这诸类作品，也尚不为过。问题还在于，他戴着崇儒、教化的有包眼镜观察作家作品，凡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就一概指斥，这样就抹杀了文学多样性的规则，不利于文学的发展。

总之，王通的文学理论，虽然对文学的本质有一定的正确认识，但由于他过分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，致使他对文学的认识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最终使他的文论成为一种重道轻文、重行轻文的理论。他的理论，在实践上对遏止齐梁浮艳文风的泛滥有积极的作用，对融合南北文风也有一定导向作用。但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开初唐王勃、陈子昂的复古先河和中唐古文家以及新乐府作家“文以贯道”的先声，对宋代理学家“文以载道”的理论更有较大的影响。

第二节 初唐的诗歌理论

公元 618 年隋代亡国，唐高祖李渊建立了新的

封建王朝——唐。自高祖武德元年(618)至玄宗开元初(713),文学史上称为初唐。初唐文坛承袭六朝淫靡浮艳的风气,宫体诗和骈文泛滥成灾,积重难返。初唐论及文学理论的,从他们的社会成份来分,有政治家,有历史家,有史论家,有文学家;从时间顺序来分,前有唐太宗、魏征、令狐德棻,中有王勃,刘知几,后有陈子昂。他们肩负着文学改革的重任,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中艰难跋涉。

这个时期论及文学理论的政治家,当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。武德九年(626)六月太宗发动玄武门事变登基即位,当年九月就下诏设立弘文馆,“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蔡允恭、萧德言等,以本官兼学士,令更宿直。听朝之隙,引入内殿,讲论文义,商量政事,或至夜分而罢。”^①据此记载,可知当时太宗定会有不少“讲论文义”的话语。惜乎没有留下片言只语,我们也不便妄猜。倒是《贞观政要·礼乐》有一段记载,从中可以看出太宗的文艺思想:

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。太宗曰:“礼乐之作,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樽节,

① 《唐会要》卷六四。

政治善恶，岂此之由！”御史大夫杜淹对曰：“前代兴亡，实由于乐。陈将亡也，为《玉树后庭花》；齐将亡也，而为《伴侣曲》。行路闻之，莫不悲泣，所谓亡国之音。以是观之，实由于乐。”太宗曰：“不然，夫声音岂能感人？欢者闻之则悦，哀者闻之则悲，悲悦在于人心，非由乐也。将亡之政，其人心苦，然苦心相感，故闻而则悲耳。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？今《玉树》、《伴侣》之曲其声俱存，朕能为公奏之，知公必不悲耳。”

太宗在这里所论的是音乐与政治的关系。他认为音乐对政治的影响，首先是作用于人，其悲其悦，主要取决于人处于何种具体环境，这就强调了审美主体的主导作用，而没有把政治得失甚至亡国罪责单纯归因于音乐。做为一代开国之君，李世民很注意于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，他曾多次强调“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”的道理，他考虑礼乐、文风、诗艺不能不注重政教作用。但从他在这里的论述来看，他并没把二者的关系绝对化。因此这一段论述，可以看作是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纲要式论断。这种宽松的文艺理论，无疑对唐初的文艺政策甚或整个唐代的文艺思想，都有积极的影响。

贞观年间，史家蜂起，修史的风气一时兴盛。贞观五年，以魏征领衔，虞世南、褚亮、萧德言等参与，受太宗之命，编成《群书治要》50卷。继之姚思廉编成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，令狐德棻编成《周书》，李百药编成《北周书》、《北齐书》，魏征编成《隋书》，唐太宗亲自领衔编成《晋书》。综观中国史籍巨著“二十四史”，有四分之一编成于这一时期。在这些史书中间，都有文苑传或文学传，而在这些传的前面往往有一篇序，或在传的后面再有一篇论。当然，这些“序”或“论”主要是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，但也有一些论及文学，可称为史家的文学理论。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魏征和令狐德棻。

魏征（580—643），著作有《隋书》的序论与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齐书》的总论。他论及文学时说：

近古皇王，时有撰述，并皆包括天地，牢笼群有。竞采浮艳之词，争驰迂诞之说，骋末学之博闻，饰雕虫之小技，流宕忘反，殊途同致。虽辩周万物，愈失司契之源；术总百端，弥乖得一之旨。^①

然彼此好尚，互有异同：江左宫商发

^① 《群书治要序》。

越，贵于清绮；河朔词义贞刚，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，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，简兹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两长，则文质斌斌，尽善尽美矣。^①

以上两段文字代表了魏征的文学观点。首先，他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和形式主义文体极为不满，对此予以了严厉批判。其次，他在批判六朝文风的时候，没有采取绝对的态度，只是要摒弃那些“清绮”的“累句”，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情感的“清音”，则要大胆“掇拾”、吸收。这对后来“四杰”在实践上吸取齐梁诗风的一些清词丽句，李白在理论上提倡“清发”，杜甫提倡“清词丽句必为邻”，都是有一定影响的。再次，他对南北文风“清绮”与“气质”的不同特点具有明确的认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是当时文人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位理论家。由于有这种清醒的认识，他又提出了“合其两长，则文质斌斌，尽善尽美”的理论。回首百年的初唐文学，正是从融合南北文风的这条道路走过来的。在百年之初，魏征即以明

① 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。

确指出这一正确方向,这不能不使人惊叹他理论的深邃和远大。但如何“合其两长”,惜乎其尚未做出明确的论述,因而还不便于应用和操作,甚或还会出现简单化和折衷调和的后果。这是这一理论的缺憾。弥补这一不足的任务,要等待稍后的史论家去完成。

令狐德棻(583—666),与陈叔达、庾俭同撰《周书》。在文学理论方面,他的代表作是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。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入手,回顾了诗文辞赋的经验教训,从而给王褒、庾信以恰当的历史定位,较为公允的评价了二人的得失成败。本文的价值在于对二人做历史观照和评价时,表露出一定的理论色彩。其理论观点,首先是强调文章“范围天地,纲纪人伦;穷神知化,称首于千古;经邦纬俗,藏用于百代”的道德功能和社会作用。这是对先秦儒家文论观点的继承。其次是反对盲目崇古复古,指出文风的改革,应该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适应,即所谓的“虽属词有师古之美,矫枉非适时之用,故莫能常行焉。”这一观点对前世后代盲目师古的行为和思潮均有针砭的作用,对韩愈、柳宗元以及宋代古文运动强调“以适用为本”的理论,也应该是有启发和实践的意义。再次,指出了历史上“时运推移,质文屡变”的规律,提出了文章应“以气为主,以文传意”即